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当代美国 华人文学中的“她”写作

——对汤亭亭、谭恩美、严歌苓等几位华人女作家的多面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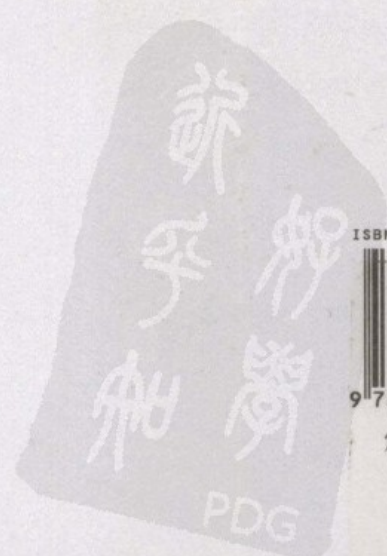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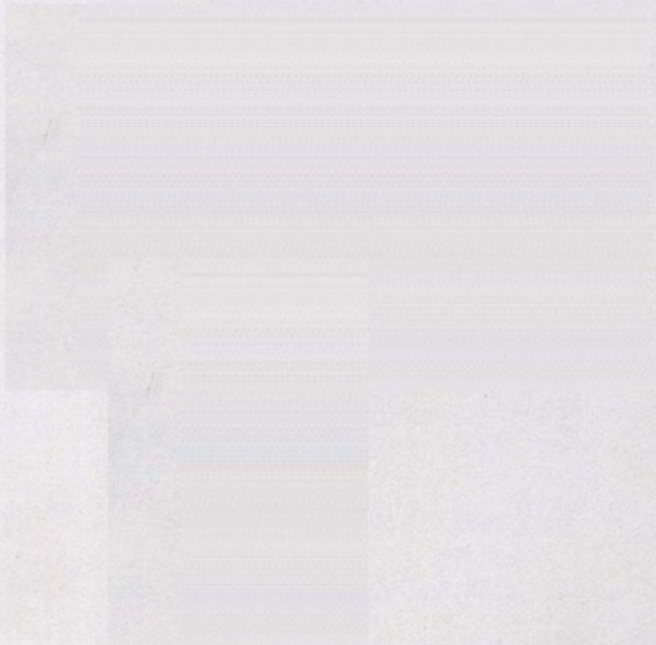
陈晓晖 / 著



出版人：方 鸣

责任编辑：洪 澜

封面设计： 周有设计
13621069113



ISBN 978-7-80222-46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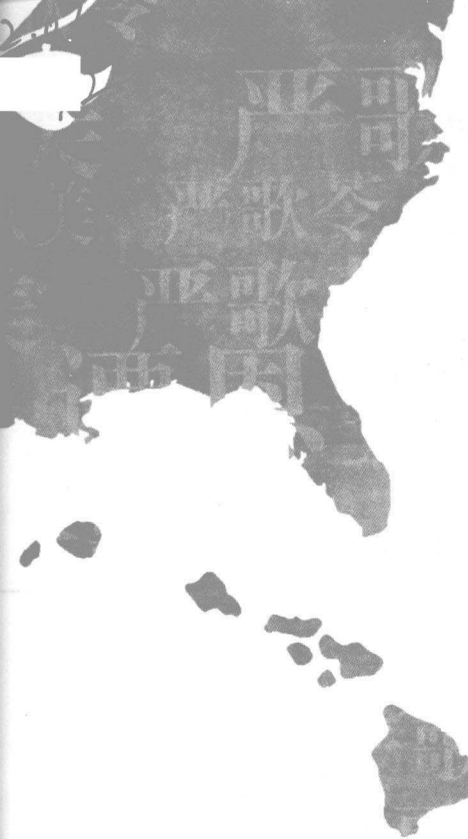


9 787802 224629 >

定价：10.00元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当代美国 华人文学中的“她”写作

——对汤亭亭、谭恩美、严歌苓等几位华人女作家的多面分析

陈晓晖 /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她”写作:对汤亭亭、谭恩美、严歌苓等几位华人女作家的多面分析/陈晓晖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05.6

ISBN 978-7-80222-462-9

I. 当… II. 陈… III. 华人—女作家—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美国—现代 IV. I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5087 号

●当代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她”写作

文库学术顾问/刘登翰

著 者/陈晓晖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洪 澜

装帧设计/周吾设计室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140×187 毫米 1/32 开 印张/7 字数/162 千字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版 次/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 册

书 号/ISBN 978-7-80222-462-9/I·41

定 价/10.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前 言

简论美国华人文学及华人女性文学

一 关于美国华人文学及其批评

美国华人文学发展到今天为止被划分为两个大型的群体：一个是华裔美国文学群体，而另一个则是华人移民文学。华裔美国文学顾名思义是由生于美国的华人移民后裔创作的文学，基本上属于英语文学。而华人移民文学则是以汉语和英语写成。

要讨论美国华人文学，我们不妨参考美国黑人文学的批评走向。美国黑人文学的批评基础正在从相对性的有色人种的少数话语演变为以更主体化的黑人美学为唯一经验的形式主义追求。“在美国，黑人美学试图制造‘黑人艺术创造和评价的独特符码’，‘黑色’本身成为衡量美国黑人文学的本体论和批评范畴。黑人美学的主要理论家之一的斯蒂芬·汉德逊认为不能像新批评学派所主张的那样孤立地考虑黑人诗歌，而应该把黑人诗歌置放于‘黑人经验’的完整语境之中。‘黑人经验’的语境是‘个人、社会、制度、历史、宗教和神话的意义熔汇在一起的复杂群体，影响到我们作为共有一个传统遗产的黑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黑人诗歌的价值只有



由占据美国黑人文化精神领域的黑人阐释团体来决定。”¹但是形式主义就像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为黑人文学走出反正白人弱化黑人形象的话语围困披荆斩棘，另一方面又使许多黑人批评家意识到黑人文学向白人文学理论的归化趋向。于是他们指出建立一个独立黑人批评权威的重要性。这个权威应该保证黑人经验不受白人的挑选和审视，并使其以“非洲”方式言说。

当我们注意到黑人文学批评的最终目的是要夺取在主流领域内的对本族裔文学的阐释权时，必须同时看到，华人文学与黑人文学的差异性要比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多得多。虽然同是美国社会的弱势族群，文化表达的孤独群体，但黑人群体和白人社会的历史渊源要大大密切于华人。在美国的经典文学中，黑人形象和黑人作品早已是不可取代的一分子，而且黑人文学的作家们也纷纷步入了经典文学的殿堂，掌握了相当的话语权力，不像华人文学这样至今还只在汤亭亭、赵健秀、谭恩美等几个作家身上打转。黑人的文化符码不但进入了文学主流，而且进入了美国的文化主流，在各种文化领域张开自己的声音。像黑人流行乐和黑人舞蹈——尽管白人并不认同在这些黑人艺术中蕴藏的“既是悲惨的升华又是悲惨的表述”²，因此在其中还存在误读部分，但这些艺术形式本身的魅力是得到肯定的，它不像华人艺术，仍和历史性的西方中国幻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美国风行至今；即使是比较弱势化的黑人电影也渐渐成为主流美学关注和吸纳的对象，但华人文化（包括亚裔文化）在美国始终是“异国情调”的代名词。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黑人对于白人来说已不再是陌生客。他们面对面地共同生活了两个多世纪，黑白两个种族的生活有许多交集，有深刻的恩怨关系，让他们彼此有冲动和机缘来互相深入了解。尽管黑人在一些白人主流符号集萃中仍被弱势、犯罪和骚乱等字眼注释，但从民族主义角度来考察，

再平和安静的陌生民族也比看起来气势汹汹的熟人要来得更令人不安和疑惑。与黑人文化在白人社会的盘根错节相比，华人在白人社会面前以构建自己的小中国——唐人街的方式将文化自闭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第一代华人移民中的许多人终老在各个西方城市中保存了故国情调的东方城中城里，一生不会用英语听说读写，他们对异质文化的拒绝是极为决绝的。作为一个移民后裔，华人对主流社会刻意地回避和拒绝沟通造成了历史上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谬误认知一点点无法遏制地扩散和夸大，这状况直到中美两国结盟的二战时期，才有所改善。出于政治考量，美国政府开始向民众宣传中华民族善良勇敢智慧的一面。这份现代的中国狂热才稍稍缓解了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陌生客色彩。但是情况却远未得到真正的纾解。

历史和现状似乎都还不允许华人文学擅自夺取对自己的阐释权。美国华人经验和华人审美从来就不是统一的。从最容易引起人们思考的语言问题来看，无论黑人批评的反对者们和倡导者们都以同样的激情来强调所谓的“纯粹性”和“完整性”，毕竟写作语言是不争的——黑人文学总是在使用英语，无限的阅读让黑人文学变得公开、透明和即时。华人文学则显示出汉语和英语两个写作团体，用汉语写作的多是来自华人地区的新移民作家，而且他们中间又逐渐分化出一个放弃母语而改以英语写作的群体。用英语写作的则是第二代或更晚近的华人移民后裔，他们绝大部分不谙汉语，甚至不了解中华文化传统。这是一个随时都处在分裂中的族群写作集合，它的核心部分似乎总在面临着“被主体化（be subjectified）”的威胁，而且在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之间缺少富于建设性的争议，更多的是纠缠于少数民族政治和话语权威确定方面的无谓争吵。很难想象一个自身不稳固的群体能够向强大的主流批评要求独立阐释权，或者这种声音会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尽管和黑人文学一



样，华人经验在族裔文学中的主导地位构建出了华人文学写作的完整图景，但是，由于语言、体认原则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对华人文学的实质批评却不得不始终徘徊在各种起源性资料的考察上。如果前瞻其未来发展方向，似乎必须要在以下两条道路上进行选择：

其一，承认分裂，保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新移民文学的涵盖和延展。让英语华裔文学重新回归美国文学领域。或者仅仅将其视为新移民文学的参照物。融入“美国文学”的批评源流之中，与美国主流文学实现同构。这是放弃了某种反文化帝国主义的情绪以及对历史形象的统一性研究趋向而达成的保守姿态。

其二，建立华人文学的自主原则。也就是以最大限度的华人经验为评判标准。而这个华人经验又必须是能够包容最广大的华人群体的。而这几乎要求一种近似世界主义的批评态度，还需要对各个写作群体之间的联系和鸿沟做完美的解释。这比它们与美国主流文学的差异更深远更难于跨越。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两种途径具有它们各自的好处，前者有利于促使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新移民文学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继承和变化上，而这与华裔美国文学在写作理论层面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放弃华裔美国文学并不会导致研究的片面化。后者则有利于扩展中国文学的开放态势。不幸的是它们不可能兼美，唯一值得探索的可能性是当我们把从华裔美国文学中得到的诸多异质文化中显现的华人经验放置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视野中时，人们将会发现在语言系统的封闭状态下被忽视的许多文学元素。对于华人经验的具体的探索，也许就是整个世界华文研究的学科基础。

二 关于美国华人女性文学

如前所述，在现在的华人文学研究领域内，在众多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之上，却没有统摄一切的通行标准。这个现状本身不容否认。而在是否有必要把汉语和英语写作纳入统一的标准或标准系统内来进行评判，又众说纷纭。华人文学的发展已经在要求华人批评界拿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写作模型和路径。在这个前提下，也许女性文学会成为一个突破口，因为感受性很强的女性经验总是比多元发展的族裔经验更容易把握。而女性书写又是文学写作的一个重大的领域。也许我们会在这个领域发现华人写作中能够给人以启发的交汇点。例如谭恩美和严歌苓。她们都是八十年代后写作的华人作家的新生代。作为两个关注华人移民史的作家，一个用英语，一个用汉语，书写出了引人注目的华人女性形象，由于语言、教育背景和经历的迥然不同，她们心目中的那一个形象有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文化性的，它源于极为纷繁的那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充满了分歧和偏见、排斥和误解，只不过这并不是人们的本意，或者也许世界的真相原本如此。但是描绘华人女性的形象的意义并不止于凸现一段历史的悲欢或是后世力图还原历史的困难和无奈，她们笔下的华人女性的形象传达的是一种声音——尽管这个声音是二重奏——民族性中蕴含的价值是极为宝贵的，无论它多么古老、多么陈旧、多么普通，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面对的事物里面，需要发现、需要辨识，不管用何种方式，何种语言，找到它的时候，它就能展现自身独特的魅力，带给众人全新的体验。

当然，这并不是说，新移民女作家和华裔女作家之间的差异就



是容易弥填的。实际上，她们的最大差别，是在如何处理与男性社会的关系，以及女性在文学中的位置。这和她们分处的社会中华人男性的境遇有很大的关系。

在美国华人女性文学中，包含着对旧大陆的越来越朦胧的回忆和对新大陆的探索与追求。华裔女性对华人历史的关注和男性一样执著和细致，但她们在其中更着重于考察华人女性的历史角色的变迁。许多华裔女性亲身经历了华人家庭中女性地位的转化，以及深深记住了她们为了摆脱父兄的阴影而做出的努力。对于许多新移民女性而言，这种来自环境的压迫也同样明显和沉重，她们要面对陌生的世界，改变自己以更加适应这个陌生世界的生存方式。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压迫。从一百年前华人女性初踏金山的土地，这个历史性的压迫就开始了。

华人移民受到的歧视是美国华人的一个世纪创口，许多华人至今不能忘怀天使岛移民过境处的壁上留诗中陈旧而依然浓烈的哀痛。许多华人也不愿意原谅，白人以一种简单得不负责任的喜剧化手法将华人刻划为女性化的民族，从而对华人男性的阳刚之气忽略不提。在白人看来，一切华人男子都是十分阴柔而男女不分的。华人没有族裔化的男性标准。白人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在故意地弱化华人民族的男性气概。就像一切感受到自身权利受到威胁的帝国主义文化一样，美国白人主流社会本身尽管并不是一个殖民社会，而是一个移民社会，帝国主义的强势姿态不是那样鲜明，但当它面对源源不断来到他的领土上的陌生遥远的民族子民时，那些白人从维多利亚时代带来的傲慢与在大工业时代产生的利益危机意识促使他们采取了与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同样的区别他性民族的态度。艾勒克·博埃默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指出，对他性民族的丑化一贯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手段，“……关于殖民活动的文字有

其特别的重要性，它揭示了那个世界体系如何把其他民族的沦落视为当然，视为该民族与生俱来的堕落而野蛮的状态的一部分”。³在美国，华人移民的地位一直和其他有色民族一样低微，甚至由于华人的生存韧性和忍耐力都超乎白人想象，因而他们被认为有更大的潜在威胁。所以白人要女性化这个民族，以减轻它所带来的不安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样的女性化描绘自然隐没了华人族裔的内在和真实的品质，给华人在美国社会的处境造成了许多不合理的痛苦，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人在男子气方面受到的歧视，至少有一个积极因素：在华裔女性面前，具有明显的男性化特征的本民族男性形象是不存在的。这样的偏见使得从一开始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就不曾遭遇到强大的男性中心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很多华裔女性离开父权家庭之后，她们的男性同胞就无力再对她们的生活有太多的干涉。在她们的心目中，缺乏建立一个男英雄主宰的世界的基础。华裔女性文学不会把力气过多地花在与男性的叙述权力相隔离上，因为华族男性的权力本身就已经受到外界的削弱。同时华族女性在她们的族裔内部的自我中心意识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稳固地树立起来。——值得注意的历史证据表明，当在美国的华人家庭发现让女孩子受教育的好处时，华人女生的入学率马上超过了华人男生以及白人女生。从某个方面，这似乎表明妇女在华人家庭中的决策权力提高了，她们在为女儿选择未来的时候着重考虑了现代文化和美国教育的重要性，同时，妇女的未来对家庭的未来所产生的影响也相应地提高了——华人家族中的男性权威对她们的制约纽带在减短，这一方面使她们失去传统文化的重心（她们不再首先是妻女或姐妹），自我失去了一定的传承性，但另一方面使得她们飘离了自己的古老的叙述空间，获得了较以往更灵活和壮阔的叙述身份。在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女性主义的倾向总是和企图创立自己的男性准



则的动机混杂在一起。因为不存在男性准则，她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写作来在女性生活里加入男性化的因素。这和西方文学的更着重于性别实际的女性主义书写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华裔女性作家并不反对男性准则，只是对此感到模糊和不确定。如著名的华人女性主义作家汤亭亭——她在本论文中也有详尽的侧面分析——在写作中很少挑战男性权威，因为在她的日常生活中男性权威很难得到清晰的体现。她在家族自传《中国佬》里写到自己的父亲时，笔下所呈现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唐人街洗衣店主形象，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而胆小怕事，被人欺凌的时候，他只是暗自咒骂，却不反抗。这个家庭中的男性代表不但缺乏鲜明的自然性征，也缺乏社会性征。他唯一的男性化表现就是坚持与女性的对立：他拒绝吃面食，因为“女人指甲里的脏东西都揉到面团里了”——他在言论上像在故国一样轻视女性，但他的权威地位遭到家庭中女性的严峻挑战，在美国社会背景下这种与性别有关的自卑观念最终所激起的不是女儿的自卑而是她的愤怒。在家庭男性式微的现实之外，华人的男性权威也很难经由对后裔的文化教育而树立起来，由于美国社会的华人传统教育衰落的缘故，大多数华裔女性对中国的文学经典几乎没有什么认识，对其中隐含的男权中心传统也就不能感受到了。同时，由于她们在写作中多是描写族裔内部的历史与现实，而且在与白人社会的交往中，她们所遭遇的种族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性别障碍，西方白人社会的男权中心传统自然也就减弱了对她们写作实际的影响。

在这样一个男权文化失重的空间里，华裔女性作家已经习惯在女性文本中将自身作为真正的中心角色，而不是通过塑造女性角色去折射女性之外的男性化的内容。这和新移民女性作家是不同的。很显然，当华裔女作家在讲述一个家族的女性史的时候，来自民族

文化繁荣的中国地区的新移民女作家很可能会用同样的题材去讲述环绕在这个女性史周围的家庭。而这个家庭，依然是以男性文化为基调的。形成对比的是，新移民女性作家显然不是很习惯于这种男权文化失重的局面。她们的文化转换还没有完全实现，女性的各种特殊性被惯性地局限在历史阐发的框架中，女性自身则往往是历史大背景的细节部分。另一方面，因为华裔女作家没有她们的性别文化属性对立面——男性。对于她们来说，无论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所主张的阳具渴慕或是阉割情结，还是女权主义者们所表现出的女性孤立主义倾向，都有些取之无用，无的放矢。华人男性在西方主流文化中的被阉割刻板印象本身就是华裔女性文化藩篱上的一道阔大的缺口，只要她们真正开始写作，就几乎可以自由出入于族裔属性和性别属性之间而不必因为受到压制而沉闷。正如汤亭亭所指出的，她的白人丈夫认为她的小说《女勇士》过于“歇斯底里”，但她认为这是因为女性的特殊经验很难在直觉层面上就实现与男性相沟通。显然，她跨出女性被歧视的华人传统比预想的要轻松多了。以一个女性的身份走出去，总比以一个文化上的附属品的身份仓皇逃离要好。在华人男性的权威缺席状态下，华人女子的自我追求是比较容易实现的。然而，不可否认许多坚持华人男性中心传统的华人“原教旨者”们感到愤懑不平的原因正是，长期以来，华裔女作家们都在面对着华人族群的中性化局面，当她们写出这个局面时，才发现这种书写实际上就是在重复白人主流强加给华人群体的不正确刻板印象。于是，她们就处在这条夹缝中，一面失去男性文化的强制性导向，一面却不自觉跟随白人文化所指引的少数族裔偏见。在这之间，华裔女性作家需要一段不短的历史阶段来摸索和寻求新的更公平的书写之途。

无论如何，华人写作群体中的女性似乎更得到她们的“少数民



族身份”或是“移民身份”的帮助而写作出富有历史质感和文化性的作品，并以此获取外界的关注。她们的成功表明，尽管在现当代的世界移民文化潮流中，华人的声音并不如许多后殖民族裔文化所发出的声音响亮，但华人女性的声音却是世界文学中不可被忽视的一部分。尤其是美国华人女性作家们联手提供了一座在女性普遍经验之上构建起来的有着混杂而丰富人文风格的文学殿堂。

三 关于论述意图

在书中，我提到了汤亭亭、谭恩美、任璧莲三位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以及大陆新移民女作家严歌苓。在大致地对美国华人女性的社会历史和文学历史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我以她们的个别作品为例，对美国华人小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开始的女性文学中突出的、或是值得关注的某一方面进行分析，如第三章以花木兰这个中国形象的外延性来论述汤亭亭的小说《女勇士》中的女权主义思想和她所讲述的女性故事的内在意义、第四章中对汤亭亭刻画的华人移民群体中的疯女人形象及其与西方女权主义意象的关系、以及第九章对任璧莲和汤亭亭的移民家族小说（《典型的美国佬》和《中国佬》）中的男性移民故事观照，或者是寻求理解严歌苓在她的华人移民文化史关注中找到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她为此写出了《扶桑》这部颇具良好反响的长篇小说。这部以早期旧金山华人妓女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在作者的浪漫主义追求之下仍然以怀旧的历史情怀取胜。因此，在第六章中，我探讨了《扶桑》的文化主题，并认为这部长篇小说是华人移民史学和华人移民文学的一次较好的融合尝试。这是因为它是在华人写作的个人经验和家族经验之外的一次想象追寻，也是一次较为纯粹的以文学审美而不是历史纪录为主

要目的的文学创作，这一类文学创作今后将会逐渐扩大其规模，并更加为批评者和读者所重视。在第八章中则探讨了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在经由男性文化修饰之后转化为影像时，它的主题和叙事方式如何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从女性主题先行转化为社群主题先行，从女性私人叙事转化为更男性化的历史叙事。在本论文的最后一章，将会重点地考察西方主流传统下的中国想象与当代华人女性写作中所蕴含的中国想象之间内在而深远的联系。由于阐释中国想象可以被视为是华人写作在西方获得阅读的一个最日常也是最容易被发现误读现象的渠道，华人女性写作就在这样一个总体的背景之下自然而然地参与到中国想象的地域距离和文化质体的大漂移中去，并且实践证明她们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同时，正是由于这种成功，使得以汤亭亭等人为代表的多元运用族裔元素的写作被一些坚持中国文化纯粹性的华人批评者大为不满。在族裔和性别的双重少数话语之间取得平衡感的华人女性作家们是否能够继续以中国想象的魅力来调谐女性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而对于新移民女作家——如严歌苓——面对东方读者和西方读者的阅读取向的差异性时，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第十章《故事漂移与中国想象》中试图对此作出一定的解读和预测。

我写作这本书的真实目的，也许就在于一个最终问题——通过观察这些女性写作者的写作细节，我们是否可以将批评视域仅仅局限在：她们确实是在探讨“华人”吗？实际上，通过几位女作家的不同叙事模型，展现出来的是更普遍的人性内心，还是隐秘深藏的族裔历史之谜？一种属于少数民族的文学，是否能够像在中国文化集团内部那样以一种绝对唯一的视角来构筑对象呢？在这些女性作家对人物、故事、背景和环境的组织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们顺应自己的族裔性的历史性的努力，她们的文学和思想的成熟过程所体现



的，不是叛逆和反对它，而是希望，希望能从自己与众不同的族裔特征出发，寻求对某种与她们的社群整体中的其他个体相似的体验的合适的文化阐释。

她们并不是在华人的招牌下千篇一律的面孔，像西方人曾经强加与华人的刻板形象一样毫无变化可言。雷蒙·威廉斯认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其生活方式必然有一种独特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不可取代的。由于历史或地域的原因置身于这种文化之外，不具备这种经验的人，只能获得对这种文化的一种不完整或抽象的理解。他指出，“……我们很有可能获得对一种更为常见的因素的感知，这种因素既不是特征也不是模式，而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借以存活的实际经验。”⁴雷蒙·威廉斯将这种共同的经验称为“感觉结构”，我所论述的几位女性作家，在华人族裔内部，显然分别具有不同的“感觉结构”。严歌苓来自中国大陆，她的感觉结构是属于真正的空间中国和文化中国的，从最广泛的角度，她与所有新移民（无论是台湾香港还是大陆的新移民）有相同的有国和失国经验，从最缜密的角度，她是大陆经历了文革之后，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化启蒙期成长起来，又随着出国潮流向美国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中的有着广泛历史经验的华人女性个体。而汤亭亭、谭恩美和任璧莲是在美国生长的第二代华裔女性，分别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她们有第二代美国华裔女性的共同经验，而实际上，她们的共同体验却仍可以更细致地分为城市华人社群的感觉结构和乡镇华人社群的感觉结构，以及生活在美国东部的华人与生活在美国西部的华人的感觉结构。汤亭亭就在一次访谈中指出，“谭恩美描写城里的年轻知识分子，而她则写‘农村里的人’。她俩个人的生活经历也不同。谭恩美的家庭原在上海地区，属于华东，而汤亭亭的家庭原在华南的广东省农村。谭恩美在旧金山长大，而汤亭亭则出生于加州中部

盆地斯托克顿的小乡镇。汤亭亭认为这使她俩有很大的区别。”⁵ 在如此详细地划分她们的不同感觉结构之后，我意识到这样的划分方式对实现研究这些女性作家的目的所起到的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醒研究者去寻找她们的作品中更深刻的内涵，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族裔认同或是对其他集体的认同上。因为无论是华人文学也好，女性文学也好，它们的最终目的和所有文学是一致的，那就是追寻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这个共同的精神家园之广大，任何人都不能独立穷之。但本书所述及的当代美国华人女性文学，即使只探寻到这个精神原野的一片寂静角落，也一样是和整个当代社会人类文学活动的律动交相呼应的。